

陆文夫



第四卷

古吴轩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陆文夫文集

第四卷

古吴轩出版社





与王蒙在新加坡



与张贤亮合影

心爱的茶壶



与老同学合影





与家人留影



2004年夏，在家中



与艾煌（右一）在会议上



与张贤亮（左一）等
老友合影



与冯骥才交谈



在书房写作

目 录

微弱的光	1
林间路	9
人多	14
花开花落	18
与友人谈快乐	22
清高与名利	24
脚步声	28
夜不闭户	32
安居	36
五十年前的今天	40
生命的留痕	43
知趣、识趣、有趣	47
哭方之	50
心香一瓣祭程小青	53
煎熬中的起飞	58
风雨中的一枝花	62
青春常在	65

乡曲儒生	68
古城遗珠	74
送鲍昌归去	76
小康老农刘振华	80
王愿坚的愿望	83
台上台下的张继青	86
江南厨王	90
后有来者是王芳	93
自强之路	97
忆朱砚馨同学	100
又送高晓声	104
一滴何曾到九泉——悼凡一同志	110
怀念徐采石	117
写写文章的人	120
老叶，你慢慢地走啊	125
酒仙汪曾祺	129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	133
寒窗梦不成——纪念费新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137
道山亭畔忆旧事	141
上黄山	148
苏州人到广州来	152
梦中的天地	163
北欧人的衣食住行	171
读吴门版画有感	182
人与城	186

古城吟	189
燕鹤之乡	194
我与苏纶厂	197
百年苏纶	199
常熟情	201
深巷里的琵琶声	204
深巷又闻卖米声	208
绿色的梦	212
狮山回头望新区	216
寒山一得	218
回太仓	222
身上冷，腹中饥	225
连云港，港连云	229
故乡情	233
难忘的靖江夹港	239
得到的和失去的	249
曲终不见人	253
人造的自然	256
送评弹进万家	259
姑苏之恋	263
解读苏州园林——谈电视艺术片《苏园六纪》.....	271
慧眼识园林——读陈健行的苏州园林摄影	274
阳刚轻柔舞姑苏	276
吴文化与现代化	280
《太湖风光》序	284

文化沧浪宜居	287
壶中日月	290
屋后的酒店	298
做鬼亦陶然	301
致鲁书妮	304
门前的茶馆	307
茶缘	310
人走与茶凉	314
吸烟与时髦	317
写在《美食家》之后	321
姑苏菜艺	324
吃喝之道	330
吃喝之外	336
吃空气	341
青菜与鸡	345
人之于味	348
永不凋零的艺术——吃	352
你吃过了吗?	356
不平常的家常菜点	360
得壶记趣	362
不可忽视的电视	368
秋钓江南	370
五岳起方寸	375

微弱的光

从某种角度来看，作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煎熬着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按照作家的愿望来实现，人类的灵魂也不完全是由作家塑造的。可是他们总是不自量力，忧心忡忡，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心血注进油盏里，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他们很少满足过，没有平静过，一种自我的骚扰贯穿了整个的生命线，烦恼大于安慰，感情的过剩有时可以造成危机。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却没有一个梦是想到要当作家的。这倒不是说我那时候便知道作家不是什么美好的职业，相反，我认为能够写书的作家太了不起。因为我七岁开始便读孔夫子的书，能够写书的孔夫子是圣人，连我的老师都要对着他的牌位叩头。不幸的是我从小便爱幻想，而幻想总是和文学有缘的，只有文学可以为一个孩子提供那么简便而又无穷的想象的天地。

想象也是需要诱发的，最先诱发我的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长江。我于1928年3月23日出生在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五岁的时候移居靠近长江边，万里长江离开我家

陈
S
大

的大门不到二百米。沙沙的涛声每日催我醒来，伴我入睡。我每天都要坐在江堤上呆望，望着那些轮船和帆船从天边出现，又慢慢地消失在天尽头。这就引起了我的遐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不出来，东望是水天一色，西望是水色一天，一片广漠的空白，遐想无所依附。

文学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它使我的想象有了依附，有了发展。文学是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开始有神仙鬼怪，接着便有爱情，有友谊，有欢乐，有眼泪；有卑鄙的勾当，有崇高的行为，有强盗的行径，有正义的事业。这一切都使我神魂颠倒，都想去经历。但是，文学中所描绘的事物都不在我的家乡，也不在我读初中的那个小县城里，最远的是在海外，最近的也在上海、南京和苏州。苏州我可以去，我的姨妈家在苏州做生意。

1944年的春夏之交，我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闯进苏州来了。苏州号称人间天堂，她的美丽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她像一部历史，一首古诗，是各种美妙的故事的发源地，这些故事都好像是在哪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的。一个梦游天地的青年终于在大地上找到了落脚点。从此我便爱上了苏州，并在苏高中就读了三年。

三年之后我发现苏州是个明媚而清澈的湖，污垢却都沉积在清水的下面。苏州有许多女人长得很漂亮，拉着她们走的黄包车夫却是一个个瘦骨伶仃、气喘吁吁的老头，天堂是建筑在地狱的上面，苏州那美丽的外表再也掩不住人民的疾苦，我的兴趣和想象便因而转向了社会，想为求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奋斗，让人人都能生活在天堂里。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有升学，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随后

又渡江回到了苏州，在《新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前后做了八年。那八年正是我们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热诚地为新社会唱赞歌，写新闻，写通讯，写社论。唱着唱着还觉得不过瘾，因为新闻和通讯都必须真实，好像嗓门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忽然之间异想天开，何不做篇小说试试呢？小说也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可以把真实加以想象而求得艺术的完美。这时候我再也不把作家当圣人看待了，因为作家和记者之间只隔了一层板壁。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说干就动手。老实说，想写小说一方面是为了替新社会唱赞歌，一方面也有点弄着玩儿，想出点儿风头，没有想到这文学是个危险的游戏。

我起早带晚，中午不休息，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做了一个短篇，寄到上海的《文艺月报》去。首投未中，却碰到了一个好编辑，他写了一封三张信纸的退稿信，说稿子虽然不能用，但他却从稿子中看出我是有创作才能的，鼓励我继续写下去。那时候我欢喜戴高帽子（现在有点吓），编辑说我有才能，那是不会假的，继续干下去！干了许多又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叫《荣誉》，《文艺月报》发表在显著的地位，而且还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我写得如何好等等。那时候写小说的人很少，能有一篇小说获得好评就可以算是作家了，我不久就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华东分会，并且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识了一大批在50年代初露头角，而今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名声的作家。这下子有点欲罢不能了，跟着又来了一个短篇，题目叫《小巷深处》。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一阵轰动，因为那时的小说都是写打仗和生产，写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写英雄主义。《小巷深处》写的是一个妓女的新生和爱情的波折，写的是人道主

陸
文
集

义，而且文笔还有点儿优美，用那时的话来说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很浓的。到了1957年的春天，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把江苏省在创作上稍有成就的人都搜罗进去，我也不当记者了，到南京当专业作家去。

真的要以作家为职业了，这事儿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对社会负有何种责任，应该怎么写，写些什么东西？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现在著名的作家高晓声、方之、叶至诚、艾煊、梅汝恺、陈椿年等人。我们几个人一研究，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政治运动。同时认为过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话现在讲出来还要防备有人来“商榷”，二十八年前提这些话简直是胆大包天！我们不仅讲，而且还准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用艺术来实现我们的主张，同时为《探求者》写了个发刊词，把这些主张都明明白白地写在里面。刊物还未办成，就开始了1957年的那一场反右派斗争。这下子闯下大祸了，我们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批判、斗争、检查、下放。陈椿年送进劳改农场，高晓声回老家去种田，艾煊到西山去种果树，方之和叶至诚去大炼钢铁，我回苏州，到苏州机床厂去当学徒，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是50年代中国文坛上颇为有名的“《探求者》事件”。我第一次当专业作家只当了不到半年，便一个筋斗栽到底，作家实在是个并不美妙的职业。

我在厂里当了两年的车工，真心诚意地向工人们学习。我觉得作家是人，工人也是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而且默默无

闻,那劳动也是很富有创造性的,很值得知识分子学习。那年头,当了个右派、反党分子等等日子是很不好过的,见了熟人也不敢点头。工人们可不管这些,只要你不刁钻,能干活,他们就亲近你,称赞你,并在暗中对你的不幸表示同情。我工作得不错,工人们都称赞,几次评为先进,得奖得过一套卫生衫和一个大脸盆,实乃不幸中之大幸。谁知这大幸之中又孕育着不幸,真是祸福难明……

到了1960年的夏天,三年困难之后实行经济调整,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了,江苏省又成立专业创作组。因为我在工厂中劳动得不错,改造得有成绩,为了体现政策,又把我调上南京,又当起专业作家来了。我吃一堑长一智,小心谨慎,不敢得意忘形。可是那时的小说已经很难写了,阶级斗争第一,人物都被拔高得足有五六米,胳膊和大腿都比普通的人大几倍。我不愿意去凑这种热闹,因为我自己只有一米七四多一点,那样的巨人我在生活中也没有见过,也许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吧,可我当时连飞机还没有坐过呢!于是我便写普通的劳动者,写工人,写劳动,写劳动中的某种哲理。由于我在工厂中劳动了两年多,有体会,写起来也别开生面,产量也是不少的。这一来又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评论我的文章也都是说好话的。这不是好了吗?慢点……

到了1964年,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了,又要大搞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小说没法写了。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很着急,便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研究到底怎样写法才好。茅盾和许多老作家、理论家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我也去了。在会上,茅盾对我的写法很有兴趣,认为

这也是无路之中的一条路，于是便在《文艺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评价我的小说。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得不是当口，那正是批评文艺界已经走到修正主义边缘的时候。陆文夫何许人也？一查，1957年的《探求者》，反党分子。完了，此人重登文坛，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批！

这一次可批得我够呛的了，比1957年要厉害几倍，前后长达半年。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江苏省的报纸用两个整版的大文章把我批深批透。那时候我的大女儿正在读小学，看到那她也看不懂的大文章竟会血压升高，昏昏迷迷。我也昏迷了，怎么昨天还说我觉得写得如何好，今天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批判和赞扬我的文章前后竟然出自一人之手，这文艺界究竟还讲不讲理？当然，批判我的人（他们也是奉命而作或闻风而动）也有理，说我是写中间人物，写阴暗面，写人道主义，不写阶级斗争，还是《探求者》的老观点，所以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1957年的事情翻出来重批。我开始是想不通，后来想通了、看穿了便感到一种幻灭，差点儿从南京灵谷寺塔上跳了下去。所以没有跳，是想看看这文艺究竟如何向下发展。我自己不能写了，也不想写了，只是想看看而已。1965年的夏天我被赶出文艺界，又回到了苏州，在一家纱厂里当修理工。不看书，更不写小说，星期天喝半斤黄酒，低声唱《贝加尔湖之歌》，这是当年的一支中国红军被逼退入苏联内时所作的歌：“在贝加尔全境都是白雪纷飞，狂风将白雪吹起散满了大地……”我唱起来声音嘶哑，热泪满面，孩子们听到我唱歌便从房间里逃出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遭殃了，抄家、批斗、挂牌、游街、请罪，一样不少，行礼如仪，可我自己倒反而不

感到有太多的痛苦了（当然也不舒服），只担心我们国家的这一场浩劫如何了结？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幸福社会，到哪天才能实现？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工人，会干活儿总是有饭吃的……且慢，工人不能让你当，叫你当农民去。1969年年底把我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要在五天之内带着全家离开苏州。一个曾经想建设天堂的人，又被从天堂里放逐出去。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了江苏北部的黄海之滨，那里当时是江苏省最艰苦的地方，被下放者称之为江苏的西伯利亚。我在那里一住便是九年，造茅屋，种自留田，其余的时间便是和一起下放的老朋友喝酒聊天，纵论天下大事，把我们的经历，把国家和个人走过的道路都作了一些总结。从我个人来说，这九年也没有完全浪费，思考了不少问题，不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那时候我们认为“四人帮”迟早会垮台，但是难以预料早在什么时候，迟又迟到哪天，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得见？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我和我的朋友们痛饮了三天之后，便把钢笔找出来了，我要写小说了，创作的冲动像一股热流在寻找喷口。可我已经停笔十三年了，许多常用的字都已经忘记，简直想不起小说是怎么写法的。我像一个卧床十三年的病人一样，爬起来扶着墙壁走路，先胡乱写点散文、剧本作为练笔，慢慢地把遥远的记忆唤醒来，然后使足力气写了个短篇。这时候《人民文学》也已经复苏，一些老编辑在到处寻找那些下落不明的老作者，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短篇一个已经写好了放在案头，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献身》，后来获得了1980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